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马克思的《大纲》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

[意] 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 主编

闫月梅 等 / 译

闫月梅 / 校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马克思的《大纲》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

[意] 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 主编

闫月梅 李楠 徐洋 张红山 孙寿涛 / 译

闫月梅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年/(意) 马塞罗·默斯托主编; 闫月梅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14-4

I. ①马… II. ①马… ②闫…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402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马克思的《大纲》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年

[意] 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主编

闫月梅 等 译

闫月梅 校

Makesi de *Dag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3.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5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顾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作者介绍

克里斯托弗·J·阿瑟 (Christopher J. Arthur), 苏塞克斯大学前教授 (英国), 著有: *Dialectics of Labour*, Blackwell 1986, 和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Brill 2002; 与人合作编有: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Essays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 Macmillan Press 1998。

约阿希姆·比朔夫 (Joachim Bischoff), 与人合作编辑《社会主义评论》(德国), 著有: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als Systembegriff (Work in Society as a Systems Concept)*, 1973; *Grundbegriffe der marxistischen Theorie (Fundamental Terms of Marxist Theory)*, 1978, 和 *Zukunft des Finanzmarktkapitalismus (The Future of Finance-market Capitalism)*, 2006-all VSA。

特雷尔·卡弗 (Terrell Carver), 布里斯托大学教授 (英国), 著有: *Marx and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Wheatsheaf Books 1983, 和 *The Postmodern Marx*,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编有: *Karl Marx: Texts on Method*, Basil Blackwell 1975, 和 *Karl Marx: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昂里克·迪塞尔 (Enrique Dussel), 墨西哥城大学教授 (墨西哥), 著有: *La producción teórica de Marx. Un comentario a los Grundrisse (Marx's Theoretical Produc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Grundrisse)*, Siglo XXI 1985, 和 *Towards an Unknown Marx. A Commentary on the Manuscripts of 1861-1863*, Routledge 2001。

伊林·费切尔 (Iring Fetscher), 法兰克福大学前教授 (德国), 著有: *Von Marx zur Sowjetideologie (From Marx to the Soviet Ideology)*, Diesterweg 1956, 和 *Karl Marx und Marxismus (Karl Marx and Marxism)*, Piper, 1967; 编有: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Studienausgabe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Study edition) (5 vols.)*, Aufbau 2004。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俄勒冈大学教授 (美国) 并兼职每月评论基金会, 著有: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1986, *The Vulnerable Planet*, 1994, *Marx's Ecology*, 2000,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2002, *Naked Imperialism*, 2006-all Monthly Review Press。

斯坦尼斯拉夫·胡比克 (Stanislav Hubík), 布尔诺大学教授 (捷克共和国), 著有: *Sociologie vědění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lon 1999。

金浩君 (Ho-Gyun Kim), 明知大学教授 (韩国), 《大纲》韩国版的译者; 著有: *Shinjeongchigyeongjeonghakgaeron (A New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Irongwashilcheon Publishing 1993 (Korean), 和 *Jesameuigilgwa Jisikgi-bangyeongje (The Third Way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Baikui Publishing 2001。

米夏埃尔·R·克雷特凯 (Michael R. Krätke),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荷兰), 与人合著: *Kritik der Staatsfinanzen (Critique of State Finances)*, VSA 1984; 著有: *Geschichte der Weltwirtschaft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VSA, 2001。目前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第四部分第十四卷的出版工作, 即 *Marx-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1857-1858 (Marx-Engels Excerpts and Notes 1857-1858)*。

费伦茨·L·伦德沃伊 (Ferenc L. Lendvai), 米什科尔茨大学教授 (匈牙利), 与人合著: *Magyar filozófia a XX. Században, I and II (Hungarian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I and II)*, Áron 2000-2001。

克里斯托夫·利伯尔 (Christoph Lieber), VSA 出版社编辑 (德国), 与人合著: *Ausbeutung, Selbstverrätzelung, Regulation. Der 3. Band des 'Kapital' (Exploitation, Self-mystification, Regulation. The 3rd volume of Capital)*, VSA 1993。

比厄·林德 (Birger Linde), 罗斯基勒大学教授 (丹麦), 著有: *De Store Kriser I. Kriseteori og kriser i 1800-tallet-inspirationen frå Marx (The Great Crises, vol. 1, Crisis Theory and Crises in the 19th Century-the Inspiration from Marx)*, Roskilde University 2004。

约翰·米廖斯 (John Milios), 雅典大学教授 (希腊), 与人合著: *Karl Marx and the Classics. An Essay on Value, Crises and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shgate 2002。

恩斯特·泰奥多尔·莫尔 (Ernst Theodor Mohl), 汉诺威大学前教授 (德国), 著有: *Folgen einer Theorie. Essays über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Consequences of a Theory. Essays on Karl Marx's Capital)*, Suhrkamp 1967。

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多伦多约克大学讲师 (加拿大), 编有: *Sulle tracce di un fantasma. L'opera di Karl Marx tra filologia e filosofia* (*On the Track of a Spectre. The Work of Karl Marx between Philology and Philosophy*), Manifestolibri, 2005, 和 *The Marx Revival. Essays on the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Palgrave-Macmillan forthcoming 2011.

卡姆兰·纳耶里 (Kamran Nayeri),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美国), 著有: 'Marx va Engeles va Ettehadieh-haye kargari' ('Marx and Engels and Trade Unions'), *Negah*, no. 17, 2005。

若泽·保罗·内图 (José Paulo Netto),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授 (巴西), 著有: *Crise do socialismo e ofensiva neoliberal* (*The Crisis of Soci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Offensive*), Encadernação 1993, 和 *Marxismo impenitente* (*Unrepentant Marxism*), Cortez 2004。

韦莎·奥伊蒂宁 (Vesa Oittinen), 赫尔辛基大学教授 (芬兰), 著有: *Spinozistische Dialektik* (*Spinozan Dialectics*), Peter Lang 1994; 并编有: *Marx ja Venäjä* (*Marx and Russia*), Kikimora 2006。

拉斐尔·波拉·莱昂 (Rafael Pla León), 拉斯维加斯大学教授 (古巴), 著有: *Una lógica para pensar la liberación de América*, (*A logic for Thinking about the Liberation of America*),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1994。

霍尔格·波利特 (Holger Politt), 华沙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主席 (波兰)。

莫伊舍·波斯顿 (Moishe Postone), 芝加哥大学教授 (美国), 著有: *Time, Labou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与人合作编有: *Catastrophe and Meaning: The Holocaust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彼得罗·里瓦斯 (Pedro Ribas), 马德里大学教授 (西班牙), 著有: *Aproximación a la historia del marxismo español 1869 - 1939* (*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Spanish Marxism 1869 - 1939*), Endymion 1990; 编有: *Escritos de Marx sobre España. Extractos de 1854* (*Marx's Writings on Spain. Extracts from 1854*), Trotta 1998。

格罗尔格·斯托伊卡 (Gheorghe Stoica), 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 (罗马尼亚), 著有: *Machiavelli filosofo della politica* (*Machiavelli, Philosopher of Politics*), La Citta del Sole 2003。

E·艾哈迈德·托纳克 (E. Ahmet Tonak), 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 (土耳其), 与人合著: *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Accou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安德烈·托塞尔 (André Tose), 尼斯大学前教授 (法国), 著有: *L'esprit de scission. Études sur Marx, Gramsci et Lukacs* (*The Mentality of Splits. Studies of Marx, Gramsci and Lukacs*), Belles Lettres 1995, 和 *Études sur Marx (et Engels). Vers un communisme de la finitude* [*Studies of Marx (and Engels). Towards a Communism of Finitude*], Kimé 1996。

马里奥·特龙蒂 (Mario Tronti), 锡耶纳大学前教授 (意大利), 著有: *Operai. e. capitale* (*Workers and Capital*), Einaudi 1966, 和 *La politica al tramonto* (*Politics in Decline*), Einaudi 1998。

内田弘 (Hiroshi Uchida), 专修大学教授 (日本), 著有: *Keizaigakuhihan'yoko no kenkyu* (*A Study of the Grundrisse*), Shinhyoron 1982, 和 *Marx's 'Grundrisse' and Hegel's 'Logic'*, Routledge 1988; 并编有: *Marx for the 21st Century*, Routledge 2006。

柳德米拉·L·瓦西娜 (Lyudmila L. Vasina), 莫斯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研究员 (俄罗斯), 合编有: volumes II/2 Dietz Verlag, 1980, II/12 Akademie Verlag, 2005, IV/3 Akademie Verlag, 1998, and IV/4 Dietz Verlag, 1988 of the MEGA²。

利诺·瓦利亚克 (Lino Veljak), 萨格雷布大学教授 (克罗地亚), 著有: *Marksizam i teorija odraza* (*Marxism and the Theory of Reflection*), Naprijed 1979, 和 *Od ontologije do filozofije povijesti* (*From Ontology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HFD 2004。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 (Ellen Meiksins Wood), 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 (加拿大), 著有: *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Verso 1988, *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 Verso 1992,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A Longer View*, Verso 2002, and *Empire of Capital*, Verso 2003。

张钟朴 (Zhongpu Zhang),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中国), 《大纲》中译本的译者之一; 合著有: 《〈资本论〉第一稿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资本论〉续篇探索》,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 年版, 等等。

(李楠 译)

前 言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大纲》(Grundrisse) 出版的漫长历程

从多方面看，在卡尔·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大纲》的地位及其命运都是独特的。首先，《大纲》作为马克思成熟时期作品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实际的原因而在马克思去世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完全不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知，这一点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们实际上几乎是完全得不到的，直到这些手稿写成后近一个世纪，它们才以《大纲》为题被整理发表。无论对其意义有何争议，1857—1858 年手稿显然是为《资本论》所做的理论努力的一部分，特别是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代表作。这一点将《大纲》与其他写作年代更早一些而同样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并添加到马克思全集中的著作，即 1932 年出版的《早期著作》(Frühschriften)，区别开来。围绕这些写于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的作品在马克思的理论发展中所占的确切位置，发生了许多或对或错的争论，但对于 1857—1858 年手稿的成熟地位，则不会有多大争议。

其次，有点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在可以确切认为最不利于对马克思进行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任何原创性发展的条件下，即在正处于斯大林时代高峰期的苏联 (USSR) 和民主德国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大纲》得以全部出版。要知道，即使是后来，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样的事情仍需得到政府当局的许可。这一点，从事他们的外文版工作的编者有理由可以证明。至今仍不清楚，当时是如何克服这些出版障碍的，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the Marx-Engels Institute) 的清洗和对该学院创建者及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 (David Ryazanov) 的清除乃至枪决，或者从 1925 年到 1939 年间负责手稿工作的帕维尔·韦勒 (Pavel Veller) 是如何度过 1936—1938 年的恐怖时期而完成工作的。有一点可能是有利的，即当局并不确切知道怎么处理这份庞大的棘手的文稿。

他们显然对于这份文稿的准确地位有所怀疑，因为毕竟约·维·斯大林认为三卷《资本论》反映了马克思的成熟立场和观点，而这些带有草稿性质的手稿并不像《资本论》那么重要。事实上，《大纲》的俄文译本直到1968—1969年才全部出版，而且，无论是1939—1941年的德文原版（出版于莫斯科）还是1953年的重印本（出版于柏林），都不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组成部分（但仅仅是“以MEGA的编排方式”），或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的组成部分而出版的。然而，与最初载于MEGA（1932年版）、后来由官方出版的马克思全集中未予刊载的1844年的《早期著作》不同，它们实际上出版于斯大林时代的高峰期。

第三个特点是关于1857—1858年手稿的地位的长期不确定性，这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关于这些手稿的名称不断变化，一直到交付打印前不久才确定下《大纲》这一名称。实际上，它们与由马克思出版和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辑的三卷《资本论》、由考茨基（Kautsky）从1861—1863年手稿中编辑的所谓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仍是有争议的。曾通读过这些手稿的考茨基似乎并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他除了在其杂志《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出版了这些手稿中的两篇摘录外，再没做什么工作。这两篇摘录分别是几乎没有影响的简短的《巴师夏和凯里》（*Bastiat and Carey*）（1904）以及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1903），《导言》从未完成，因而也未在185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发表。它后来成为那些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拓展到流行的正统观点之上的人（特别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早期依据。迄今为止，《导言》可能是《大纲》中受到最广泛讨论的部分，虽然本书援引的一些评论者质疑它是否属于《大纲》的组成部分。当时，手稿的其他部分仍未出版，实际上也一直不为评论者们所知，直到梁赞诺夫及其在莫斯科的合作者于1923年获得了这些手稿的照相拷贝，将它们按顺序整理并计划在MEGA中将它们发表。猜想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即如果它们按最初计划的那样在1931年发表，将会造成什么影响。它们实际的发表日期——1939年末和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一个星期——意味着它们几乎仍然完全不为西方所知，直到1953年东柏林的重印本发行。虽然鲜有几本到达美国，但从1948年以来，这部作品就得到伟大的先驱式的《大纲》阐释者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的分析，当时他经由奥斯威辛（Auschwitz）和其他各种集中营刚刚到达美国（Rosdolsky 1977）。很难相信，这部大部头的德文原版著作“被寄到前线作

为反对德国士兵的宣传鼓动材料，后来又被寄到战俘营作为战俘的学习材料”，从而达到了其理论或实际目的。

1939—1941年版的全文重印本成为国际上接受《大纲》的第一个版本，它于1953年在民主德国重印，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出版提前了几年，但有意割断了与这些著作的联系。除了一处例外，这部作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产生重要影响。这处例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一节，它于1939年用俄文首次单独出版（正如稍微早些时候出版的《货币章》的情况）。它于1947—1948年被译成日文，1952年用德文再版，而后又被译成匈牙利文（1953）和意大利文（1954），当然也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中得到了讨论。带有一篇解释性导言的英译本（Marx 1964）不久就以西班牙文在阿根廷（1966）和佛朗哥的西班牙（1966）出版。可能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社会人类学者对它的特殊兴趣，以及它与争议颇大的对第三世界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特定相关性，这一文本在人们可以得到全文《大纲》之前得到了广泛的发行。这一文本为西方因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集权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Wittfogel 1957）这样的著作极具争议地重新恢复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提供了线索。

关于《大纲》的接受史

1857—1858年手稿的接受史实际上开始于1956年危机之后，当时，在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各国共产党之内和之外，大家主要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正统的紧身衣中解放出来。无论是1844年手稿，还是1857—1858年手稿，既然它们不属于“经典著作”的正式全集，但无疑又是马克思所写的，那么，正如本书第三部分有几章所表明的那样，它们都可以被视为合法突破共产党内一贯封闭的立场奠定了基础。几乎同一时间，国际上对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作品的发现——这些著作在苏联第一次出版的时间是1957—1959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相信《大纲》具有异端倾向，表现为此时出现了非官方的自由作家的译本，如法国人文科学出版社（the French Editions Anthropos）出版的改良主义者的译本（1967—1968）和《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支持出版的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的译本（Marx 1973）。在共产党之外，《大纲》起到了证明一种虽非共产主义的但无疑仍是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造反时代，这一点才开始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重大意义就已经被接近法兰克

福学派传统的、学问精深的德国人如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和年轻的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认可，只是这种认可并不具有政治行动主义的背景。在快速扩张的大学中，学生日益激进，这也为像《大纲》这样极端难懂的文本提供了以往未曾料到的更大规模的读者。要不是因为这一点，像企鹅图书（Penguin Books）这样的商业性出版公司肯定不会愿意出版《大纲》，即使是作为“塘鹅马克思文库”（“Pelican Marx Library”）的一部分。同时，这一文本在苏联也或多或少有些勉强地被接受为马克思著作全集的内在组成部分，在1968—1969年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以前版本中，尽管是以一种小于《资本论》的开本的形式。随后不久，它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版了。

因此，将有关《大纲》的争论与其政治背景分开是不容易的，而且是政治背景激发了这些争论。在争论最激烈的20世纪70年代，它们也遭受了代际障碍或文化障碍，即大多数（主要是中东欧的）极富献身精神且学识渊博的先驱派马克思文本学者如梁赞诺夫和罗斯多尔斯基等陆续辞世。一些严肃的努力实际上是由较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知识分子做出的。他们尝试着对1857—1858年手稿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更具体地说，在成为《资本论》躯干的总体计划中所占的位置进行了较早的分析。然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战则是由像法国的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这样的对马克思的文献坦率说并不十分了解的理论家发起的。这些论战被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所接受，这些年轻人可能当时还十分缺乏对这些文本的了解，或者说也缺乏能力判断过去有关它们的争论。但愿是由于语言的原因。一点也不奇怪，像本书中有关意大利那一章所说的那样，“《大纲》……的接受颇具独特性”，这不只适用于一个国家。

总的看法

眼下的这本论文集出版于目前这样一个时代，此时，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运动在全球舞台上仅仅是不太重要的角色，有关其学说、战略、方法和目标的辩论也不再是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随者的著作的辩论的必不可少的框架。然而，此时世界呈现出的状况也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做的分析独具只眼。也许这是一个恰当的返回对《大纲》的研究的时机，这时候的研究将不那么受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谴责斯大林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垮台之间这一时期左翼政治短视考虑的妨害。从任何方面说，《大纲》都是一部非常难懂的文献，但也是一部非常值得读的文献。这是因为